

1987年美国十六本畅销书之一

生死

方耀光
郑培君
方耀楣·译



郑念●著
(自传体小说)

在上海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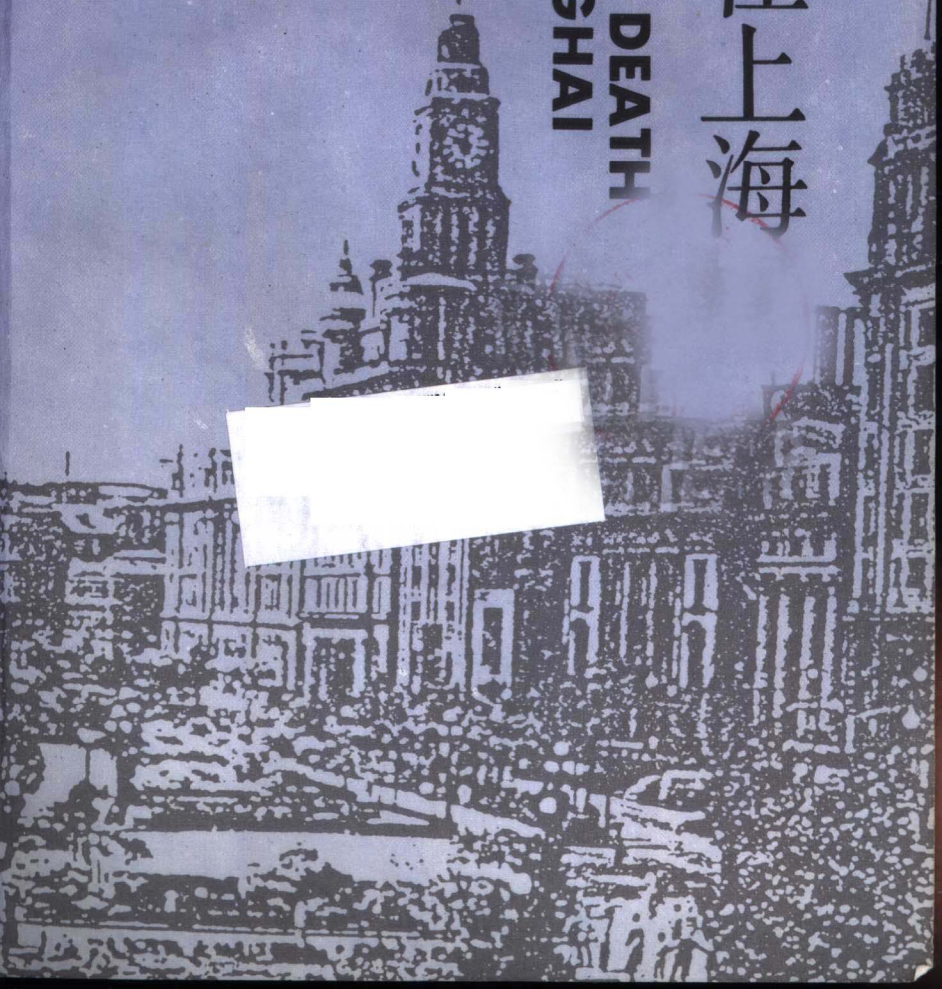
求知书刊社编辑 百家出版社出版

生死在上海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郑念●著

方耀光
郑培君·译
方耀楣



责任编辑 葛伟昌
封面设计 王申生

生死在上海

郑念 著

方耀光 郑培君 方耀楣 译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9.875 字数39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900000-01-1/I·02

定价：4.30元

(内部发行)

**LIFE AND DEATH
IN SHANG HAI**

本书根据 Graf.on Books
(A Division of the Collins
Publishing Group) 1987年
海外版译出

求知书刊社编辑

百家出版社出版

(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出 版 说 明

作者曾长期生活在上海。本书是她离开上海定居美国后所写，并在美国出版。它记述了作者“文化大革命”中在上海的亲身遭遇，有时也回溯到其他时期的经历。这些记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我们把它翻译出版，内部发行，以供有关人士参考。

本书是据英文本翻译的，除个别字句略有删节外，尽量保持了作品内容和风格的原貌。

献给梅萍

目 录

第一部 革命风暴

- 第一章 在劫难逃..... 3
- 第二章 风暴前的宁静.....41
- 第三章 毛的信徒.....76
- 第四章 银铛入狱..... 107

第二部 拘留生涯

- 第五章 孤独的监禁..... 141
- 第六章 审问..... 165
- 第七章 一月革命和军管..... 195
- 第八章 党派斗争..... 232
- 第九章 连续不断的迫害..... 280
- 第十章 弟弟的忏悔..... 319
- 第十一章 种种折磨..... 346
- 第十二章 出狱..... 381

第三部

- 第十三章 梅萍，您在哪里..... 407
- 第十四章 水落石出..... 437
- 第十五章 与众不同的学生..... 470
- 第十六章 毛泽东之死..... 513
- 第十七章 平反..... 555
- 第十八章 别了，上海..... 583

尾 声

第一部

革命风暴

第一章 在劫难逃

时光仿佛又回到了1966年6月那个炎热的夏夜，那是在我上海老家的书房里。我孤单地在书房里呆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发出徐缓的旋转声。桌上白色乾隆花瓶里的素色的康乃馨已中暑枯萎了。靠墙排列着一些书架，里面是英文和中文的书籍。台灯光下，房间的一半处于阴影之中，柔软的沙发上织锦缎的红色垫子闪烁着光亮。

记得一位在上海经常访问我家的英国朋友称这里为乏味都市中舒适、优雅的绿洲。的确，我的住房虽不是西式的公馆，但它是够舒适的。当城市被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改造时，为保持继续享受高雅的情趣，我便精心安置自己的家，使其成为我和女儿生活中的避风港。

共产党接管这个城市十七年后，在上海，私人很少有象我这样的居住条件。这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大约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家庭仍保持着老的生活样式：维持着他们原先的家，雇了保姆、佣人。党并没有命令人们如何生活。事实上，1949年，当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后，他们阻止我们解雇家庭佣人，以防加重失业问题。不过定期的政

治运动的震荡使许多从前富裕的人变穷了。他们遭难，被迫支付巨额罚金，或者收入猛然减少。许多工商业者由于政府的安排，当工厂被撤出上海时，家庭也一起被安置到内地。我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标准。上海市人民政府，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对我还是比较礼貌且有些照顾。不管怎样，当时我和女儿生活还算平静。由于相信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对此我们有长期的准备。

现在我时常回想起1966年6月3日午夜前的几个小时，其原因不仅仅因为我怀念着过去的岁月，并回顾与我女儿在一起度过的生活，而且因为这几个小时是我许多年正常生活的最后时光。

都市的夏夜闷热得犹如天空中悬挂着一个罩子。没有一丝风从窗外吹进来，我伏在桌子上，阅读报纸上激烈、带有恐吓的文章，这意味着一个政治运动开始了。我的脸和手臂被汗水弄湿了，宽大的衬衫也粘在背脊上。宣传机构是为了努力制造紧张的气氛和动员群众。经常细致地阅读这些党的积极分子撰写的文章，对运动的趋势及可能波及的受害者会得到某种暗示。因为我以前从来不卷入政治运动，所以我并没有预感到自己将大难临头。不过，在宣传文章里采用如此激烈的语言，始终使我心神不定。

我的佣人老赵为我在咖啡桌上的盘子里放了一只盛冰茶的保温瓶。我一边喝着这清凉的茶，一边把视线停在我丈夫的照片上。他死了，快九年了。由于他的死而留在我心中的空虚仍然存在。每当我对政治形势无法理解时，我

感到孤单和无所适从，我多么需要他的支持。

1935年在伦敦，我们相遇时，他正在攻读哲学博士。我们结婚后，于1939年回到了战时陪都重庆，他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1949年，共产党军队进入了上海，他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共产党的代表章汉夫接管了他的办公室。章邀请他留在新的政府里。于是，在过渡时期他被上海市长——陈毅元帅新任命为外交事务顾问。后来，他经允许离开人民政府，接受壳牌石油公司的提名，成为它的上海办事处总经理。壳牌是具有国际水准的少数几个英国企业之一，犹如帝国化学企业、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他们都企图在上海保持一个办事处。壳牌石油公司是希望留在大陆中国的世界性的大公司。

1957年，我丈夫死于癌症。一位新任命的英国籍总经理继位。我应壳牌石油公司的要求成为他的助手，头衔是总经理顾问。以这个资格工作到1966年。

自此，英国总经理依靠我设法使公司躲开了许多陷阱。这些陷阱往往是围绕着在毛泽东中国能否保持住有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办事处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我必须面对不是牺牲壳牌石油公司的尊严，就是使中国官方失去面子的选择。我的工作是管理职工，做总经理与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工会之间的联络工作，分析工会的要求，拟订妥协的计划。我用中文起草了许多公司与中国政府经理处之间的重要通信。每当总经理回家或去北京与中国政府官方公司交谈时，我就行使总经理的职权。有这样一个能够胜任的工作，我是幸运的。在上海，我为享有在世界著名

的公司里从事高级职位仅有的女性的殊荣而欣喜。

1966年春天，与中国政府经理处谈判并签署了“资产负债协议”后，壳牌石油公司关闭了它的上海办事处。我们拿走了在上海的资产，中国政府经理处接纳了我们的职工，并许诺聘用他们，提供退职养老金。作为一个管理人员，我的安排没有包括在协议里，它的范围限制为属于壳牌石油公司工会的职工，而壳牌石油公司工会是控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政府组织上海总工会的一个分支机构。

协议签署时，我的女儿——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正与她的同事一起在中国北方演出。我想等她回来，就去香港旅行。不过，正在我等待她回来期间，文化革命开始了。我女儿他们被电影厂火急召集回上海，参加文化革命。由于我知道政治运动期间，政府当局不愿作什么决议，政府部门的工作即使还没完全停顿，也已出现普遍怠工现象，我不愿冒被驳回的危险，便没有立即申请去香港旅行。因为予以驳回的决定会变为个人的档案材料，警察就是用它来管理每个人的。而且，这会给今后的申请带来困难。我留在了上海，相信文化革命象通常的政治运动一样，不会超过一年时间。

喝了茶使我有凉快。我站起来进入我卧房的另一扇门内。淋浴后我躺在床上。尽管炎热异常，我还是睡着了。我的女佣人陈妈轻轻地推醒了我。看了一下床边柜上的钟。刚刚六点敲过，但阳光已从窗外射了进来。房间里的温度上升了。

“你们老办事处的秦和另外一个人来看你。”陈妈说。

“他们想干什么？”我懒洋洋地问她。

“他们没有说。不过举止好象有点不正常。办事处没有关闭前，他们来是先客厅等着，这次直接进入起居室，就坐到沙发上。”陈妈说。

“另外一个人是谁？”当我在浴室里听她说时，我问。秦，我知道他是上海市总工会下属的我们办事处分会的副主席。我经常和他谈判，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他似乎是个随和、知理的好人。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想他可能是一个门卫。”陈妈说，“他又高又瘦。”

从陈妈的叙述中，我猜想此人是壳牌石油公司工会的积极分子。公司的工会里没有党员。从这些积极分子的行为来看，我想他们被鼓励成为上海市总工会在我们办事处的看门狗。尽管我没有与这些不是门卫就是清洁工的积极分子直接接触，但我知道他们是这些部门的头。

有人敲门。老赵——我的男佣，递给陈妈一只盘子，透过半开的门说，“他们讲，要女主人快点。”

“好的，老赵，”我说，“告诉他们我一会就下来。给他们冷饮和香烟。”

我并不急。我需要时间思考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这两人在大清早来访是不正常的。尽管在中国，无论在哪里，人们必须出席会议，听演讲或政治训导，事先也很少被告之。每当人们被召唤时，为服从政治的需要，任何人都将停止所干的一切事。我奇怪这两人来是不是要我

去听政治教育的演讲会？我知道上海市总工会正为壳牌石油公司以前的职员组织一个班，以便他们在薪水较低的政治机构里任职。当我吃吐司和饮茶时，回想起主持壳牌石油公司办事处停业的经过，检查了自己在公司与中国经理处谈判时的态度，尽管在所有的会议中我都陪着总经理，但是我没有参加任何讨论。我仅仅是在回到办事处后，对总经理的工作作些评论并提些忠告。我决定，如果问起有关壳牌石油公司的问题，我将提出得向伦敦写信要资料，拖延一下再说。我穿了一件白的棉布衬衫，一条灰色的便裤和黑色的凉鞋。中国妇女在公共场合穿衣尽量想避免显眼。当我下楼梯时，我想，他们派人一大早来叫我，也许是想让我不得安宁。我走得很慢，竭力显得镇静、沉着。

我走进起居室，看见他们俩手脚伸展地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橘子水。看到我时，秦习惯性地站了起来。看到另一个积极分子仍然留在座位上，秦脸胀得通红，窘迫极了，急切地又坐下了。1949年，共产党进入上海后不久，主管我居住地的警察，第一次不打招呼就闯进我的家门。警察在门前不理睬老赵，就直接进入起居室，并在地毯上吐唾沫。我第一次看到了权势造成的无礼态度，以后，我认识到，党的下级官员往往用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自卑感。

我不理睬秦的狼狈和另一个人的无礼，坐在椅子上，平静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大清早就来找我？”

“我们是来带你去参加会议。”秦说。

“动作这么慢，这样我们会迟到的。”另外一个人站了

起来，补充道。

“参加什么会议？”我问，“谁组织的？谁派你们来要我参加？”

“不需要问这么多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权威的话，我们就不到这里来了。所有壳牌石油公司从前的职工都参加这个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会议。”积极分子说，用愤怒的音调，他又接着说，“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

“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我说。

“毛主席说，中国的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文化大革命。”秦说。

他们两人一起急切地说，“我们要迟到了。我们必须立即离开。”

秦也站了起来。瞧了一下壁炉上的座钟，八点一刻。

陈妈拿着我的手提包和海军蓝的绸阳伞在客厅里等着。

当我从她那里接过东西时，我笑了笑，但她没有用笑来回报我，显得很担心。

“我回来吃午饭。”我想安慰她。

她只是点了点头。

站在一边的老赵打开了前面的门。他看上去也很忧虑，没有说话，在我们后面轻轻地关上了门。

佣人们的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知道毛泽东统治的十七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就再

也没有回来。

街上几乎没有人，但公共汽车里挤满了神态严肃的乘客。车子走的是迂回的路线，九点钟过后才到达目的地。

许多年轻的男女聚集在一所技术学校的门口。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他们发现了我们从公共汽车站走来，一些人叫喊着“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奔进了大楼。

有人对我的护送者急躁地说：“这么晚来？会议讲好是八点开始的。”

两人转过头朝我瞥了一眼，说：“问她。”说着急急忙忙地进了大楼。

刚才出来问话的人现在对我说了，“这儿来。”我跟着他进了会议室。

很大的房间里挤满了人。在房间前排狭窄的木条凳中间我发现了壳牌石油公司的医生和另外一些老职员。在他们的后面还坐着驾驶员、门卫、开电梯的工人、清洁工和办事员。在这些人中间还有一大批年轻人，他们可能是学校的学生。相当一批人站在过道上和房间的后面。炎热的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户射进沉闷的房间，却很少有人使用扇子，屋子里气氛既紧张，也带有一点期待。当我寻找分配给我的第二排的座位，目光掠过那些在同一办公室相处近九年的老职工时，他们没有一个与我打招呼，好象也根本不认识我，许多人扭转了视线，少数人目光与我相遇似乎有难言的苦衷。

我不知道壳牌石油公司关闭办事处后的几个月里，这些人在干些什么。他们是壳牌石油公司和人民政府经理处

之间审定的“资产负债协议”的真正受损者。自从1920年以来，几乎所有人都为壳牌石油公司干了好长时间。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他们大多数人放弃住宅和家庭经过长途跋涉从上海去了战时陪都重庆。留下来的另外一些人，宁愿忍受巨大的经济上的困窘，不愿为接管了壳牌石油公司房产的日本火油公司服务。他们大多数人年近六十，快退休了。这个协议表明，他们将全部到政府机构中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同以往地位相同的工作，只是作为职员或者翻译被录用。工资级别低了，甚至退休养老金也减少了。由于协议是政府要他们接受的，没有人敢反抗协议的条款。总经理和我试图从工会主席那儿获得一种保证，但是我们却被告知，每一位职员对协议的条款都是满意的。

在与壳牌石油公司工会主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他对我说：“每个人对前途都非常满意，因为他们摆脱了为外国商行服务的不正常身份，作为政府机构的工作者，他们将为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只是官方的观点，对此，就连工会主席自己也不太相信。在办事处关闭最后的日子，一些老职员来到我的办公室，摇着头悲切地讲：“没有法子！”这句非常普通的中国话，意思是“无能为力”、或者说是“没希望”、“没办法”、“没有答案”。

从九点到应该休会的午饭时间得三个多小时。随着时间的流逝，房间里已热得使人难以忍受。我知道自己必须保存能量，等待演讲的结果。坐在狭窄的木条凳上就象战争期间在重庆为躲避日本飞机的燃烧弹钻山洞那样不舒